《台灣文學學報》第三十五期
2019 年 12 月　　頁 35-64

記憶所繫之處：戰後初期在台日僑的文化活動與記憶政治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中文摘要

舊日本帝國崩解後東亞出現大規模的人口移動，本文將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重新檢視在台日僑文化人離境前的文化活動與社會觀察等。他們離台後如何「複寫」台灣記憶，回望殖民地的「台灣鄉土」？其中呈現怎樣的記憶政治。

本文首先釐清日僑戰後初期的台灣記憶內容，其中包括對登台中國軍容的記憶敘事與台灣人的反應、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證言、對台灣友人的悼念、東部墜崖自殺事件的傳聞敘事等。其次，釐清日僑在台的文化活動，包括編譯、戲劇活動、木刻畫交流等。最後，檢視在台日作家戰後初期的記憶書寫，其中西川滿的小說多以台灣的地景作為小說舞台，刻劃物件藉以舖陳情節，異國情調、台灣鄉愁、殖民反省摻雜其中。但，濱田隼雄除了殖民反省之外，更重視小說中人物交流的細節與互動的過程，包括戰後初期他與來台外省籍版畫家黃榮燦和台灣學生林素琴的往來。總之，本文藉由在台日僑戰後初期各種的記憶文本的爬梳，重新理解戰後初期在台日僑文化人記憶所繫之處，在於他們如何跨時代、跨國籍、跨越語言積極地重建台灣文化和記憶台灣。

關鍵詞：戰後初期、日僑、記憶、二二八事件、複寫、集體記憶

2019 年 9 月 12 日來稿；2019 年 11 月 15 日審查通過；2019 年 12 月 5 日修訂稿收件。
DOI: 10.30381/BTL.201912_(35).0002

Where the Memory Is: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Memory Politics of Taiwan-Japanese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Wang, Hui-Che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article will re-examine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social observations of the people in the intellectuals' circles of Taiwan-Japanese. How did they "Repeat" Taiwan's memory after leaving Taiwan and look back at the "Taiwanese native land" of the colony? What kind of memory politics is presented?

First of all, illustrate the contents of Taiwan's memory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ncluding the memory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he Taiwanese reaction, the historical testimony of the 228 incident, the mourning for Taiwanese friends, and the rumor narrative of the suicide in the eastern cliff.

Secondly, define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aiwan-Japanese in Taiwan, such as compilation, drama activities, and engravings.

Finally, examine the memory writings of the early Taiwan-Japanese writers in the post-war period. Among them, Nishikawa's(西川滿) novels mostly use Taiwan's landscape as a stage of novels, and the objects of depiction are used to lay out plots,

exotic sentiments, Taiwan nostalgia, and colonial reflections. However, in addition to colonial reflection, Hamada Hiroshi(濱田隼雄)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of character exchanges in the novel, including his dealings with mainlander engravings Huang Rong-can(黃榮燦) and Taiwanese student Lin Suqin(林素琴)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n short, by sorting out the various memory text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we can re-understand the memory of Taiwan-Japanese in Taiwan. They actively rebuild Taiwanese culture and memory Taiwan by crossing the times, across nationalities, and across languages.

Key words: Early post-war period, Taiwan-Japanese, memory, 228 incident, repeat, collective memory

記憶所繫之處：戰後初期在台日僑的文化活動與記憶政治*

一、前言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告戰爭結束，台灣島內的人民瞬間從戰時空襲警報聲中解放出來。台人、日人自此分道揚鑣走向各自的「戰後」，但島民對於即將到來的國民黨政權抱持著各種想像與不安。東亞境內因二戰結束而出現大規模的人群遷移，各自找尋返鄉和生活重建的道路。台灣島內政權更迭人來人往，台灣人自中國、日本、南洋戰區等地「返台」；外省籍知識分子、政商投機者等跨海「來台」找尋工作機會；在台的日人官僚、除役軍人、民間人士，甚至同屬殖民地的朝鮮人，戰後也紛紛「準備離台」。然而，這群人卻在戰後初期的台灣島上短暫交會，並留下屬於他們的台灣記憶。

二戰結束時台灣社會對於在台日人相對友善，日本政府遲至 1946 年 2 月才向美軍商借船艦，在國家系統性的支援下，啟動大規模的撤僑作業。在這期間在台日人的社群中流言蜚語不斷，但事實上，在蔣介石對日「以德報怨」的指示下，他們還是生活如常，甚至在台除役的軍人，亦如民間人士一樣行動自如。在台深耕多年的日人（包括移民村的農民們），或內台通婚者雖多期盼能繼續留台生活，但仍被迫遣返離台，唯部分官僚和技術人員被陳儀政府留用[1]，直到二二八事件後因台灣政情不穩，當局對留用日僑有所顧忌，日僑見狀才決意離台。

---

*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賜予相當多具體的寶貴意見，但卻因篇幅限制，刪除多處引文實證難以備全，唯日後將另行補充。

[1] 有關留用人員的相關研究可見陳偉智，〈知識的接收—國分直一與戰後初期的臺灣研

本文將試圖從舊日本帝國崩解後，東亞大規模移動的歷史語境中，重新檢視在台日僑文化人離境前的文化活動與社會觀察等。這群因帝國瓦解而被驅離殖民地的日僑離台後，他們又如何「複寫」（re-writing）台灣記憶，回望殖民地的「台灣鄉土」？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指出，集體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在一個社會中有多少群體和機構，就有多少集體記憶。這些不同的記憶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員通過經歷很長的時間才得以建構起來的，而進行記憶的是個體，不是群體或機構。但是，這些根植在特定群體情境中的個體也是利用這個情境去記憶或再現過去。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個體通過自身的「位置」來進行回憶，藉以統整群體的記憶[2]。因此，筆者將重新爬梳日僑個體的戰後初期記憶，探討這個群體如何在日本戰後社會的情境中重構這一階段的台灣記憶（其中包括二二八的記憶）。揚・阿斯曼（Jan Assmann）將外部的記憶再細分成四個維度討論，包括：模仿性記憶、對物的記憶、交往記憶（語言與交流）、文化記憶（對意義的傳承）[3]。日僑返日後，通過日記、文學文本和畫作「再現」了他們的對物的記憶、在台的交往記憶、對台灣庶民生活和宗教儀式等，形成另一種後殖民的文化記憶，這些記憶又如何折射台灣戰後初期的另一種社會心理現象呢？

在台日人因帝國殖民擴張政策移居來台，因久居繁衍進而產生土地認同，視台灣為安身立命的「故鄉」。但，帝國崩解後身為殖民統治者，因日本敗戰而被迫「離鄉返國」。返日後有人選擇沉默不語，不再提及台灣殖民地經驗，但亦有如西川滿等人透過書寫台灣反覆溫存台灣記憶，對鄉土的認同游移於「雙鄉之間」，「個人記憶」中總是混雜著「帝國記憶」。由於返日初期飽受同胞冷眼以

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61 期（2018 年 6 月），頁 97-157、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與留用：兼論臺灣高等教育的復員〉，《臺灣文獻》61 卷 3 號（2010 年 9 月），頁 287-329 等。歷史學界的研究較側重他們的學術貢獻，然筆者較重視他們的文化活動與記憶內容之討論。

2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2003 年），頁 39-40。

3 揚・阿斯曼（Jan Assmann）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0-12。

待，更強化了他們對台灣鄉土的執念，過去的、「美好」的「殖民地／出生地」成為他們「鄉愁」安頓之處和記憶場景，轉身抹去身為殖民者的過往。

在台日人曾在戰後初期僅存的《台灣新生報》、《人民導報》、《中華日報》的「日文版」上積極爭取可能的話語空間。《人民導報》創刊之際，日文版主編甚至呼籲在台日僑協助接收政權建設新台灣，並反省日人再教育等問題[4]。戰後日僑在政治上雖已喪失留台的權利，但他們置身台灣當時的歷史現場，在中國人、台灣人、日本人三者新恩舊義的權力關係中，亦留存屬於他們戰後初期的集體記憶。因此，本文首先將釐清日僑戰後初期的台灣記憶內容，其次釐清在台日僑的文化活動。最後，檢視在台日作家戰後初期的記憶書寫，以期釐清在台日僑戰後初期的文化活動與記憶政治。

二、日僑戰後初期的台灣記憶

從日本敗戰至 1946 年 3 月才開始撤僑，前後約莫花費了七、八個月的時間，在台「日僑」、就地退伍「復員」的官兵雖以戰敗國之民滯台，以旁觀之姿觀察台灣社會的變化。小說家日影丈吉（1908-1991）當時在台退伍，貼近庶民生活發現日常食物竟不虞匱乏，社會頓時充滿和平的喜悅與解放感[5]。台北逐漸恢復往日的活力，豐富的食物排滿街頭，令人不可思議[6]。光復後台北物資雖然豐盛，但池田觀察比較當時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儀容，發現：「因為中國人大都錢周轉得好，大多穿得好。相較於此，生活困難的台灣人並不好，和殘留的日人一樣。而且體格、臉型、舉止行動方面都很不一樣。[7]」顯然，族群間的經濟條件等似乎從外表舉止便能窺其一二。

在大規模的遣返作業結束之後，約有三千多位的官僚和技術人員等因留用滯台。在文化界留用的日僑主要以學校教師（例如舊帝大教授等各級學校）和日人記者居多。長官公署所屬的《台灣新生報》和國民黨宣傳部的《中華日報》

---

4 不著撰者，〈歡迎投稿〉，《人民導報》，1946 年 1 月 8 日，第 3 版。

5 日影丈吉，〈消えた家〉，《日影丈吉全集 6》（東京：國會刊行會，2002 年），頁 545。

6 池田鳳姿著，陳藻香譯，〈《台灣的家庭生活》點滴及戰後初期的台灣・艋舺〉，《台灣文學評論》5 卷 2 期（2005 年 4 月），頁 33。

7 林樹理，〈二月反亂見聞記〉，《台灣青年》第 27 期（1963 年 2 月），頁 9。

因保留「日文版」（1946 年 2 月-10 月）需要而留用編輯人才，協助過渡期的文化事業，包括協助官方從事翻譯和媒體宣傳工作。例如：《人民導報》自 1946 年元月開始闢設日文欄供日人發表意見，在第三版的「日文版」上連載了不少針對在台日僑讀者的社論和日本內地政經社會的即時消息。

當時在長官公署在其組織架構中，特別設立台灣省編譯館進行台灣文化重建的工作下設四組單位，國分直一、池田敏雄、立石鐵臣等戰前《民俗台灣》同人幾乎都被編入「台灣研究組」，繼續在台進行民俗採集與考古工作。他們除了與台籍知識菁英關係密切之外，與來台的中國文化人亦互動合作良好。他們藉由編輯、翻譯將在台日人的學術資產保留在台灣的學術界。戰後初期因留用滯台，成為「在場」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日僑，事件爆發的當下雖未捲入這場暴亂中，但是，返日後他們卻分別以不同的形式記憶轉述，目睹當時的台灣社會情況及二二八事件的動亂，以下考察歸納他們滯台記憶書寫的重點。

（一）對登台中國軍容的記憶敘事與台灣人的反應

台灣總督府於 1946 年 3 月才開始撤僑，滯台日僑心情忐忑不安，目睹第一批中國軍隊登台的情況。他們和台灣民眾一樣對國民黨陳儀政府來台的軍容驚異不已。當時塩澤亮（1904-1976）在其畫卷上寫著：「進駐的中國軍隊打赤腳，用雨傘、扁擔挑著鍋子、爐子、棉被，也沒有鎗。難怪陳儀長官率領的中國軍隊，令迎接的台灣人啞然。中國軍隊進駐之後，台灣人回復了對日本的尊敬與信賴，真是諷刺的事。[8]」

二二八事件後灣生畫家立石鐵臣被強制遣離，對他而言離開台灣不只是「離鄉」而是「失鄉」，喪失創作的立足點。因此，在他返日後五〇年代的參展畫作中幾乎見不到他「寫實的」台灣風景。他改以超現實主義的畫風，展演絕對空無的「虛空」和個人生命本質的孤獨與寂寥之感。直到 1962 年為探訪病中的福島繁太郎才重拾台灣記憶，製作《台灣畫冊》藉以聊慰友人[9]。鐵臣的探病

[8] 塩澤亮繪著，張良澤譯，《從台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一位台北女子師範學校教授在戰爭末期的紀錄》（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 年），頁 70。

[9] 志賀秀孝，〈虛空を旅する描き「立石鐵臣」の正体——愛惜の涙を心の絵の具にかえて〉，

之作成為他戰後重新正視戰爭虛無與離台傷痛，自我療癒遣返傷痕的起點。根據夫人立石壽美的回憶，鐵臣在家庭生活中絕口不提工作之事與「過去之事」[10]，或許他已將過去的台灣記憶封存在畫冊中。在《台灣畫冊》的〈日僑篇〉中，他也畫出當時的歷史場景：「國民政府軍隊步伐堂堂地穿過寫著『台灣光復』的大歡迎門。但他們的軍服並不一致，有的打赤腳、有的背著黑雨傘、有的背著只有棉布的捲被子，也有用扁擔挑著鍋爐的部隊。[11]」

另外，安藤芳男也觀察到台灣人面對接收的反應：「看慣了紀律嚴整的日本軍隊的台灣人，這下子在我們日僑面前丟盡了臉。我軍雖被解除武裝，但比起這個精銳部隊，仍有數倍以上的信賴感。看了這場面，內心暗暗稱快。[12]」。他語帶嘲諷地回憶起戰後台灣人見風轉舵的態度。但在這種欠缺殖民反省的台灣密話，正反映出帶有軍國主義意識者的真實心態。然而，他殊不知當時駐台的美國官員也正從背後同情起日本人，因為他們必須和台灣人一樣要忍受到處劫掠的中國軍人[13]。

日本敗戰後台灣人一夕之間從戰敗國的「皇民」變成戰勝國的「國民」，然而竟在短短的一年內對於國民黨政府從希望到失望，最後只能走上絕望的反抗，二二八事件前夕「日本時代」竟成為「不勝嚮往」之詞[14]。當時日僑陸續變賣家產離台，報紙的「日文版」成為日台友人話別的園地，遣返後的艱困仍等待著他們；同樣地，台灣人也得面對國民黨官僚的君臨接收和戰後的生活重建。戰後初期他們共同經歷了時代的轉變和對未來的生活不安，在這段時間他們建立某種特殊的情感結構，登台中國軍容也成為他們共有的記憶畫面。

《麗しき故郷「台湾」に捧ぐ——立石鐵臣展》（東京：府中市美術館，2016 年），頁 4-11。

[10] 立石壽美，〈立石壽美女士來函，1999.5.14〉，《淡水牛津文藝》第 4 期（1999 年 7 月），頁 192。

[11] 立石鐵臣，〈日僑篇〉，《立石鐵臣台灣畫冊》（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7 年），頁 36。

[12] 安藤芳男著，張良澤譯，〈終戰前後的台灣秘史——未被發表過的台灣內幕〉，《淡水牛津文藝》第 5 期（1999 年 10 月），頁 207。原刊於《今日の話題》第 91 集（1961 年 3 月）。

[13] George H. Kerr 著，詹麗茹、柯翠園譯，《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台灣教授協會，2014 年），頁 85。

[14] 楊村（揚風），〈祖國啊！祖國〉。轉引自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台北：聯經出版，2016 年），頁 203。

（二）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證言

二二八事件後，官方緊急調派台南號於 1947 年 5 月遣返這群留用日僑，遣返醫護船隻約載了千餘人，其中包括台灣大學留用的淺井惠倫、矢野峰人、森於菟等人[15]，這批留用日僑成為在日轉述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歷史見證者。

王育德（1924-1985）戰後在日創辦《台灣青年》雜誌（1960-2000），雖以譯介轉載報導台灣即時政治、文化相關的資訊為主。然而，他在亡命日本初期，便開始蒐集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資料，希望這個事件揭櫫於世，創刊之初每逢二二八前後皆刊載紀念特輯。1963 年他特邀日人撰稿，刊出特輯「日本人の見た二・二八」（日人所見的二二八），其中收錄了守田富吉、林樹理（池田敏雄）、金關丈夫和松居桃樓的回憶文章。

守田富吉 1933 年自台灣大學畢業後任職於台灣專賣局，在台灣島內與東南亞地區從事鹽業調查和開發的工作。日本敗戰時與家人身處台北，他追憶當時回歸祖國的台灣人歡天喜地。由於陳儀來台隨即重申對日人「以德報怨」，雖有例外，但台灣人或中國人對戰敗國國民相對尊重，家人未受到迫害生活如常，對此至今仍稱謝不已。

1946 年 11 月告一段落後，守田以技術人員的身分留用，調往台南市的鹽務管理局任職。豈知才一年的時間，台灣社會情勢驟變，台灣人反政府和反外省人的情緒高漲，究其原因不外乎通貨膨脹生活困難、失業者眾多、外省人官吏的無能與貪污、語言不通、急速激烈地去日本化政策。然而，他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應是，文化程度較低的人治理文化程度較高的民眾的為難之處，也因此轉而出現親日的現象。

當時官方人才任用的問題引發諸多不滿，守田憶及當時鹽務局只要局長一換人，行政人員就大批更換，一次二三十位。薪資方面日本人外地加俸五六成已讓台灣人憤恨不平，外省人加倍支薪，許多官方單位甚至直接公然地向廠商收取一成回扣的現象。即使如此，他仍客觀地補述外省籍主管中尚有清廉之士，

[15] 河原功，〈解題〉，《台灣引揚者關係資料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2011 年），頁 6。

但在劣幣逐良幣的情況下，他們也很快就失勢離職。在守田的回憶敘事顯然並未刻意抹煞，曾有優秀外省籍人才理台之事實。

二二八事件發生當下廣播與報紙皆使用日文，讓人產生又回到戰時的錯覺，事件時他因有事回台北，車上學生腰間繫槍來回巡視，用台灣話和日語盤查，外省人則到處躲藏。事件過後他回到台南，台南非常平靜地由政府接管，外省籍的市長（筆者按：卓高煊）倉皇逃亡。湯德章（1907-1947）被推舉出來，擔任台南市的處理委員會的負責人，最後竟由他一人扛下大部分的罪責，他因為不忍卒睹槍決現場而未上街。然而，這整個事件讓守田最為感動的是，台灣人的作法真是「漂亮」。即是台灣人群起包圍政府機關，但卻未見暴行掠奪。雖然見到外省婦人被要求下車的景況，但卻未見搶奪施暴之行。趁治安混亂之際，流氓們闖進中國官員駐強劫之事時有所聞，但卻與抗議群眾無關。守田很自覺在文末特別重申提醒讀者，不要誤解台灣人的親日態度，因為他們不會希望隸屬日本的，而是由衷盼望建立台灣人的台灣[16]。

當時新婚的池田敏雄亦置身台北，目睹了二二八早上的示威遊行活動，他認為那是在黑暗政治下賭命的大眾運動，充滿著庶民的氣味，雖是偶發事件卻充滿了緊張感。當日群眾在專賣局的台北分局進行抗議，他從遠處就見到路面上焚燒香菸和器物的情況，但示威群眾並未搶奪公共物品或外省人的個人物品，這是讓台灣人事後值得感到驕傲的事。

事件爆發後的十天池田幾乎都待在家中，生活所需的物品等都由台灣人的女傭協助處理。收音機整天開著，透過斷斷續續的消息了解外界的狀況。其中，《台灣新生報》刊出柯遠芬廣播內容：「如果讓日本人這樣的外國人看到我們兄弟吵架的話，或許會拍手叫好。台灣同胞得三思。」如此牽扯到日本人的談話，讓池田深覺不悅[17]。池田的日記內容詳述事件爆發之後個人和友人的親身經歷[18]，然而最讓他感到恐怖的經驗，是接著一連串的撲殺逮捕事件[19]。

---

[16] 守田富吉，〈二二八事件当時の回想〉，《台灣青年》第 27 期（1963 年 2 月），頁 4-8。

[17] 根據不著撰者，〈柯參謀長的沉痛語堅持國家民族立場〉，《台灣新生報》，1947 年 3 月 5 日，第 1 版，柯遠芬在接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代表時曾稱：「此次本事件之發生，無論政府與民眾都很對不住國家民族的，發生事件的那一天，我接到兩個報告，第一個是美國人在那裡拍影片。第二是說日本人在歡喜慶祝。我聽了這兩個消息，比較聽到政府

二二八事件發生當天金關丈夫與台大醫學院的同事余教授、蔡助教和國分直一一起剛從大社平埔族部落完成田調，返回台南。因此，未親眼目睹台北當時的情況。當時他們的妻小仍留在台北而深感不安，他和國分兩人先買車票北上。車廂座位前方恰巧坐著一位外省籍的孱弱老人和纖瘦的十四、五歲少女，3 月 2 日他們在竹南站遇上了暴動，火車因而停駛，兩人想辦法掩護著他們。在月台上雖見到好像焚燒外省人東西的餘燼還冒著煙，但有一位男子卻昂然地說：「我們是不會搶奪外省人的東西的。」在候車室本省籍的站長強力地將群眾趕出車站，介紹他們先去站前的旅館投宿。當晚竹南下起雨來，飛機的轟炸聲劃過天際，聽到竹南被轟炸得很嚴重的消息。收音機傳來嘉義廣播局的呼告，學生隊伍在機場苦戰求援，當時顯然已陷入戰鬥狀態，但怎麼聽都只有嘉義的放送廣播。4 日早上街上未見殘兵恢復平靜，據旅店老闆說那兩位外省人也沒事了。5 日火車才重新開動。這個暴動令金關感到相當心寒，因為不知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的事件[20]。

當時留用於台灣省教育處擔任助理員的新垣宏一（1913-2002）卻有不同的回憶記述：

> 這時我聽說許多台灣人被殺，台南的王育霖亦被擄走下落不明。我在動亂事件後，兀自晃進台北市內，未親眼目睹台灣人的屍首。雖然日後看了各種書籍，皆記載此時有兩萬之多的台灣人被殺害，跟我實際體驗不同。倒是親眼看過許多台灣人對外省人採取報復的暴力行為，而外省人（主要是官員）四處逃竄的景況。我家也躲進被台灣人追趕的外省人家族。台灣人搜查時，說日本人是台灣人的友人，不許幫助外省人等，而我們夾在中間。[21]

人員及民眾的死傷更痛心，我的淚也落下來了。」類似這樣的說詞。

[18] 池田敏雄，〈敗戰日記Ⅱ〉，收於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6 號（東京：綠蔭書房，1993 年），頁 106。

[19] 同註 7，頁 8-12。

[20] 金關丈夫，〈すれちがい〉，《台灣青年》第 27 期（1963 年 2 月），頁 13-15。

[21] 新垣宏一，〈第七章　二二八動亂〉，《華麗島歲月》（台北：前衛出版，2002 年），頁 76-77。

若檢視在台日僑的記憶內容可發現，他們並不刻意強調加害者或被害者的問題，守田和池田特別強調遊行示威群眾的理性訴求，並未見他們對外省籍婦孺訴施以暴力或搶奪財物之舉，一再強調不應將他們的訴求行動與趁亂搶劫民家的流氓地痞混為一談。但，當時台灣社會省籍對立劍拔弩張混亂的情勢，卻讓他們甚感驚懼不安。金關和新垣雖理解同情本省人對國民黨陳儀政府的憤懣與怨懟，但從人道立場仍試圖出手掩護遭受波及的外省籍人士。

（三）東部墜崖自殺事件的傳聞敘事

東部墜崖自殺事件的傳聞反覆出現，起因可能是《國是日報》上的一則報導〈花蘇道上一慘劇〉：

> 今日上午自花蓮北行汽車一輛，搭載客十餘人，於開駛蘇澳途中，突有士兵十餘（番號尚不知）人攔搭時，司機以人數已滿，恐有危險，拒絕搭乘無效，司機仍以日語招呼客人下車，汽車駛未數十步，即〝砰〞然墜海，十餘人士兵與司機全部葬身大海，狀至殘酷，又聞該司機於拒絕搭乘時，曾被一部兵士毆打，詳情容後續志。[22]

這則新聞刊出後遍傳全島群情激憤，陳儀據悉，隨即命令當時的警總參謀長柯遠芬詳查。經公路局與駐花蓮港部隊調查，結果既無車輛失蹤，亦無士兵傷亡[23]。由於這個事件墜崖事件或許太過震撼人心，幾經渲染引起民間社會喧擾不已。官方見狀在《中外日報》上又特別澄清[24]，然而，官方的澄清似乎未獲得大眾信任。以至於這個事件仍重複出現在台、日人士記憶述事中，甚至重新被編織進入二二八的記憶文本中。守田的記憶述事提到：

---

[22] 筆者未見報紙資料，轉引自褚靜濤，《二二八事件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220。

[23] 柯遠芬，〈事變十日記〉，《正氣月刊》2 卷 2 期（1947 年 5 月），頁 41。

[24] 不著撰者，〈花蓮北行汽車 傳無墮（墜）海情事〉，收於林元輝編，《二二八事件台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9 年），頁 2237。

據傳事件（按：二二八事件）爆發當時，陳儀政府為增強台北的警備，命令調派屯駐在花蓮港軍隊的一個大隊北上。（中略）。他在巴士出了街市之後，讓車掌小姐下車，自己一個人開著滿載的士兵前行。從花蓮港街道那頭的斷崖上，墜入數百公尺的海中，無論人或車消失得無影無蹤。他赤手空拳阻止一個大隊北上，為此全島人民感激不已，捐助大筆善款給他身後唯一的老母親。[25]

守田將時間錯置於二二八事件中，強調司機是「菲律賓回來的特攻隊的台灣青年」。日人末光欣也的專著中，亦同樣記述如下：

之前約莫 1946 年 10 月，傳說在台灣東部曾發生戲劇性的事件。面向太平洋沿岸行駛於宜蘭經蘇澳到花蓮間宜蘭客運的定期路線巴士，載滿乘客駛向花蓮，在路上向前行駛時，被列隊步行的國民黨軍人群起槍擊，強行命令停車，要求坐霸王車。（中略）

巴士在進入蘇花公路（臨海道路）後加速在斷崖絕壁的道路上行走時，郭姓司機一邊咒詛國民黨政府的暴政，一邊高喊台灣萬歲。加足馬力大打方向盤，就這樣全速從斷崖衝進太平洋海面。騰空的巴士車體掉落猛撞在波浪拍打的礁岩，全員死亡。[26]

這個「傳聞」陸續被轉譯成為小說情節，西川滿直接將這個事件置入，以二二八事件為時代背景的小說〈惠蓮的扇子〉(《キング》2 月號，1955 年 2 月初刊）中。但是，二二八事件之前西川業已被遣返，仍使用耳聞而來的題材。

坐在司機旁邊的指揮官命令：「要去救援暴動，開到台北去！」

巴士司機稍作思考時。（中略）

下一個瞬間，他們聽到「台灣獨立萬歲」！司機異常的叫聲。不！在聽

[25] 同註 16，頁 6-7。

[26] 末光欣也，《台湾・激動の戦後史 二二八事件との前後》(台北：致良出版社，2006 年)，頁 83。

> 到的同時他們也看到，從大斷崖上頭朝下翻落於海中的巴士激起了泡沫……。
>
> 這個司機在戰爭時期當過志願兵，接受日本軍事訓練的男子。他的犧牲精神的確與神風特攻隊相通。即使是一位在鄉下無名的青年，都和日本人有同樣的想法和行動，這個事實你認為如何？[27]

這個事件除了日人的記憶敘事中出現之外，台籍作家蔡德本也在 1947 年以這個事件為題材撰寫過了小說，卻因他被捕入獄而銷毀。1993 年他再根據自己的札記和記憶重新撰寫的〈消失的項鍊〉(〈消えたロザリオ〉) 一作[28]。然而，作者在敘述墜崖事件過程中，車輛的行駛方向與日人的記憶有異，是由蘇澳駛向花蓮港。作者以全知的觀點，詳述中國士兵如何羞辱司機 Sayumu。Sayumu 又如何回擊，但令人不解的是，只有日本人才會以「清國奴」一詞羞辱台灣漢人，在這裡原住民怎麼也使用「清國奴」和「豬」的字眼來怒罵中國士兵呢？這種述事方式顯然隱含著當時省籍作家對來台中國政權高度的不滿情緒。

同樣地，李喬在《埋冤 1947 埋冤》也安插了這個墜崖事件[29]，小說採倒敘的方式，藉由漁民楊阿生陳述這個事件傳聞的來龍去脈。同樣是因中國軍隊為了急援鎮壓因二二八所引起的鳳林暴動，驅趕乘客下車強佔巴士並與司機發生的衝突事件。盛怒的司機一樣怒罵中國兵「清國奴」，並在前往鳳林路上的賀田山鹽寮港，唱著日本軍歌墜海。但是，巴士行駛的方向與墜海的地點又與前述的文本又甚為不同。

綜觀比較上述的各種文本，可見這個事件是戰後初期台人與日僑共有的記憶事件。他們在聽聞、記憶、再現、改寫的過程中，事件的主角身分多為戰前曾受日本過軍事訓練，當過自願兵的台灣青年或阿美族人，其中一位記述他是戰後是從菲律賓（守田），一位卻寫說從蘇門答臘群島返台（李喬）。總而言之，他被形構成是一位戰時曾接受日式軍事訓練，視死如歸勇於犧牲的英雄。

---

[27] 西川滿，〈恵蓮の扇〉，《アンドロメダ》第 250 號（1990 年 6 月），頁 7。

[28] 周華斌，〈消失的項鍊再現光芒—蔡德本〈消えたロザリオ〉譯後記〉，收於許素蘭編，《洄溯與再生—台灣文學史料集刊》第六輯（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6 年），頁 99-106。

[29] 李喬，《埋冤 1947 埋冤》（台北：海洋台灣出版社，1994 年），頁 146-155。

因此，當中國軍隊強占巴士，他才會憤而將巴士駛進太平洋墜崖，與士兵們同歸於盡。

主角之所以壯烈犧牲主因不堪國民黨的軍隊強徵橫奪，或為了減少二二八事件鎮壓的死傷人數，巴士司機儼然成為傳聞事件中的抗暴英雄。然而，細究每個文本發生的時間、墜崖的地點、主角身後留下的親人、事件過程的描述，互有出入摻雜再現者撰稿時的主觀意識。包括事件發生的時間，在二二八事件之前、當下、之後皆有之。除了李喬的小說之外，墜崖地點多在清水斷崖，但巴士行駛的方向卻又互異。台籍的作者強調司機咒罵中國士兵「清國奴」，而西川滿或許是受到五〇年代在日台獨運動的影響，竟出現「台灣獨立萬歲」的口號。回憶文本多以轉述傳聞的方式陳述，但小說文本卻以全知的觀點鋪陳司機與士官兵之間的衝突和主角的心理轉折過程。

這個事件雖見新聞報導與澄清，但至今仍真偽難辨莫衷一是，或許當時這只是一個單純的交通事故。但因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民怨積累已深，藉由這個事件的渲染傳播，創造屬於地方的英雄抗暴敘事，藉此消解他們當時對接收政權的憤懣。在台日僑也將轟動一時的「傳聞」，置入他們戰後初期的記憶書寫中。但記憶所繫之處卻不在於質疑事件的「真實性」，而是當下台灣人抗暴的集體情緒，藉此突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必然性與悲劇性。

（四）日人對台灣友人的悼念

二二八事件後甚至到白色恐怖時期的清算逮捕的過程中，犧牲了不少台灣菁英，其中包括相當多報社的媒體人，例如曾擔任《台灣新生報》經理的阮朝日（1900-1947）、日文版總編的吳金鍊（1913-1947）和《民報》社社長林茂生（1887-1947）等人皆於事件後慘遭逮捕殺害或下落不明。關於這些台籍菁英之死，島內的親友深懼遭到連累而噤若寒蟬，唯有返日後的日本友人才得以隔海撰文紀念英靈[30]。

[30] 呂東熹，《二二八記者劫》（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16 年）。

戰爭末期 1944 年 4 月台灣島內報紙統合整併，原任《台灣日日新報》政治部部長的栗原廣美與《興南新聞》的吳金鍊成為同事，然而，戰後局勢逆轉栗原成為協助《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的留用日僑，返日後與台籍 R 君在日本重逢聽聞吳君之死，憶及離台前兩人相處點滴愕然不已，特別撰文以茲悼念，像吳金鍊這樣的民族主義者竟遭殺害，令他難以置信[31]。

戰後隨即離台的戲劇家松居桃樓（1910-1994）雖未目睹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過程，卻特地撰文紀念陳炘（1893-1947）和林茂生兩人[32]。松居 1942 年因受皇民奉公會總部招聘來台，致力於台灣演劇協會的戲劇指導，同時在台發表多篇演劇相關的文章。1946 年返日後進入電影界企劃東寶電影《決闘の河》，五〇年代在東京隅田公園協助設立「バタヤ部落・蟻の街」，入住該部落長達二十多年，1958 年以聚居於此的下層勞動者及其見聞為題材，撰寫了《蟻の街のマリア》並成為當時的暢銷書[33]。

在這篇紀念文裡，他特別追憶 1942 年 8 月 20 日出席皇民奉公會在台中州支部召開的歡迎松居的文化人集會的情況。會場中隱約可見高等警察的身影穿梭其間，當天陳炘很不客氣的對著他說：「如果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而是由支那本土來的漢民族來統治，我想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悲劇。」之後，兩人舌槍唇戰，座談會的最後，陳炘對他下了個結論：「我相信你，單就你個人，但我還沒有打算相信全體日本人。可是，我們來做個約定。如果你在台灣為台灣而死的話，從那天起至今的怨恨我將一筆勾銷，相信你所謂的『日本人的善意』。」會後，在返回台北的火車上，總督府情報課課員告訴他，陳炘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巨頭，之所以會出任皇民奉公會台中州的生活部長，是為了避免島內出現各種鎮壓事件傷及台灣人，將自己作為防波堤。對松居而言，能夠得到台灣這樣一流人才的「信任」，就猶如得到六百萬島民的信任。因而他在內心裡發誓，一定要在台灣為台灣人而死，因為在這世上，沒有比「士為知己者死」更喜悅的事了。

---

[31] 栗原廣美，〈吳金鍊を憶ふ〉，《全國引揚者新聞》第 3 號，1948 年 10 月 1 日，第 4 版。

[32] 松居桃樓，〈もしもあのとき——陳炘と林茂生さんの死——〉，《台灣青年》第 27 期（1963 年 2 月），頁 16-19。

[33]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 年），頁 96。

林茂生於戰爭末期擔任皇民奉公會總部的生活部長，在台灣演劇協會的辦公室裡松居曾與他談笑過，但敗戰後兩人卻未曾謀面。主要是因為林茂生身兼台大教授，請託者眾多，忙碌異常。松居為了友人請託希望在台留用之事，特地前往報社並苦等了一個多小時。看到《民報》社論的呼籲「暴虐的日本人早一點從台灣驅逐出去……」，他全然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請求他協助。林聽完他的來意後，叨唸他「總是為別人的事奔忙」，隨之答應此事，但讓他詫異不已的是，林同時請求他「留下來」，這樣的慰留讓松居感動不已[34]。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島內陷於戒嚴與白色恐怖時代，這些菁英之死在島內成為政治禁忌，鮮少有人敢撰文悼念。因此，最早憶及公開悼念這些人的，反而是被遣返離開的日僑，因為當時只有他們才享有公開追思友人道盡過往的「自由」。

三、戰後初期日僑的文化活動

戰前活躍於台灣文壇的日本文化人，依其戰前所屬的同人雜誌可以分成《文藝台灣》和《民俗台灣》同人社群。他們離台時間不一，但對戰後台灣文化重建工作一直抱持高度的關心，在等待遣返的期間，仍積極地投入在地的文化活動，以下歸納說明其活動概況。

（一）翻譯編輯與文化出版活動

《民俗台灣》的雜誌日人戰後多受到台灣大學，或台灣編譯館等官方單位「留用」貢獻長才，其中金關丈夫、國分直一（1908-2005）留台期間的學術研究成果多發表在《台灣文化》上。除此之外，當時金關丈夫以「林熊生」的筆名出版了日文偵探小說《船中の殺人》、《龍山寺の曹老人》。池田敏雄則投身編譯工作，除了編輯金關的作品之外，還編輯了《三民主義の研究》（1945）、蔣中正的《新生活運動綱要》、《孫中山先生傳》（1945）、《初級華語會話》等。隨之，又編輯蔣中正的《中國の命運》（1945），請楊雲萍抄譯《開戦前夜の東京》

[34] 同註 32，頁 19。

（1945）等。之後，他因結識黃榮燦（1920-1952）輾轉認識木刻家朱鳴岡（1915-2013），因朱鳴岡的推薦才得以留任在台灣省宣傳委員會出版部。

戰後《民俗台灣》雖未能復刊，但 1946 年 4 月日僑遣返作業告一段落後，池田與留用在台北的友人森於菟、金關丈夫、矢野峰人、國分直一、立石鐵臣、早坂一郎（1891-1977）、松山虔三等人發行同人性質的《回覽雜誌》[35]。這群文化人最初顯然是計劃在台長居久安，繼續推動民俗考古等文化活動與學術工作，豈知時局驟變，最後只能默然返日。

（二）戲劇演出活動

從二戰結束到二二八事件的一年半期間，台灣從殖民體制和戰火中解放出來，文化人興致高昂地投入台灣文化重建的工作。當時在台戲劇方面為因應中國化之需，欠缺台灣人生活與歷史經驗對話的中國話劇被強勢植入主導台灣劇運[36]，然而，在這期間在台日僑也短暫地投入戲劇活動。

戰前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等人雖曾積極投入台灣文壇的建設，試圖建構屬於在台日人的台灣文學。戰爭末期文學動員成為總力戰動員的一環，在台日人被賦予領導島民文學奉公動員的重責大任，西川滿也身先士卒積極投入各項動員活動。戰爭末期空襲不斷，經歷了戰火的摧殘。戰後西川滿發現已難再從事出版工作，改採戲劇演出的方式參與戰後台灣文化重建活動。當時他與濱田隼雄（1909-1973）設立了劇團「制作座」，由北里俊夫（1913-1980）主持，在其住處集結文化流浪人。

第一次公演由北里俊夫改編監製馬瑟・巴紐的〈芬妮〉，由宮田彌太郎、鈴木陽平協助舞台設計，跨越語言的隔閡，觀眾據說有很多是來自中國的觀眾。在準備第二次公演濱田隼雄的〈橫丁の圖〉時，結識黃榮燦。準備第三次公演之際，台灣已開始進行日僑遣返作業，演完〈滅滿興漢の旗の下に〉之後便結束了這系列的戲劇活動[37]。這三齣戲於 1946 年 1、2 月間演出，假台北市中山堂

[35] 張良澤，〈池田敏雄先生年表〉，《台灣文學評論》5 卷 2 期（2005 年 4 月），頁 64-65。
[36] 徐亞湘，〈省署時期台灣戲劇史微探〉，《戲劇學刊》第 21 期（2015 年 1 月），頁 77-79。
[37] 西川滿，〈創作版画の発祥と終焉：日本領時代の台湾〉，《アンドロメダ》第 271 號（1993 年 3 月），頁 11-12。

公演，每齣戲三天。第三齣〈滅滿興漢の旗の下に〉(《孫中山先生傳》前編）於 2 月 11 日以日語演出。該作品是描寫辛亥革命與袁世凱陰謀稱帝的故事。分四幕五場。濱田隼雄編劇，北里俊夫導演，服裝由宮田晴光設計。演員名單中出現「速河柾夫」之名，顯然濱田可能亦串場演出活動。《人民導報》也特別報導：

> 自帝國主義必然受世界民主思潮淘汰，隨即改變作風，從事民主藝術之活動。目前新作〈排滿興漢の旗の下に〉此劇描寫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與推翻專制政策之情形。[38]

制作座本擬續演孫中山傳後編〈滅滿興漢の旗の下に〉，但因團員皆被遣返而作罷。這個劇本可能改編自池田編譯的《孫中山先生傳》。據此可知，戰後在台日僑以中日交流為由，取得他們在台公開演出的正當性，但他們的中國認識顯然是承繼中華民國的國族敘事觀點，利用有限的資源貢獻僅有的文化能量。

除了制作座的演出之外，1946 年 10 月由在台日人（沖繩籍）組成的「高安爆笑劇團」演出日本式的滑稽戲〈心之建築〉，前後共公演五場，觀眾幾乎都是日本人，賣座不惡[39]。另外，亦尚有不少娛樂性質的日人劇團進行演出活動[40]。

（三）中、日木刻畫的交流

戰後初期有一批從事文藝工作的中國青年渡海來台，他們曾是中國抗日期間文宣隊的活躍人物，抵台後多任職於報社和雜誌社從事編輯工作，或在學校擔任教員，在這期間留下一些反映戰後初期台灣社會和批判精神的木刻版畫[41]。其中，黃榮燦、朱鳴岡和陳耀寰應是當時最早來台的木刻畫家，前兩位與在台日僑文化人往來最為密切。西川和濱田對黃榮燦的印象特別深刻，返日後隨即撰文紀念這段跨國情誼[42]。

---

[38] 作者不詳，〈留臺藝人改變作風排演中國革命劇〉，《人民導報》，1946 年 2 月 13 日，第 4 版。
[39] 焦桐，《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台北：臺原出版，1994 年），頁 152-154。
[40] 同註 36，頁 78。
[41] 謝里法，〈中國左翼美術在台灣（1945-1949)〉，《台灣文藝》第 101 號（1986 年 7 月），頁 130-131。
[42] 濱田隼雄，〈黃栄燦君——終戦後の台湾で〉，《文化広場》3 月號（1947 年 3 月）。濱田

黃榮燦（1920-1952）1945 年 12 月以記者的身分抵台，1946 年元旦隨即在當時的中山堂舉辦個展[43]。他雖不諳日語，但版畫藝術卻成為他與日僑文化人共同的藝術語言，時常以筆談的方式進行溝通交流。黃榮燦在台北的版畫展是戰後台灣最早的創作版畫展，西川滿認為他的刀法清晰度絕佳，但多數的作品缺乏東洋味深感寂寞。嗜「書」成性的西川滿經常流連於東寧書局，兩人因而常在那裡相遇，最後也經濱田隼雄等人的斡旋，該書局頂讓給黃榮燦，並設立創造社發行月刊文藝美術刊物《創造》，立石鐵臣也留在那裡幫忙。

濱田隼雄來台前即曾參與過左翼運動，在台奉寫實主義為寫作圭臬，他與黃榮燦雖然語言不通，但或許是左翼關懷抑或某種文藝信念的契合，在這期間兩人卻建立了超越國族的友誼。濱田撰寫的〈小說 木刻畫〉中詳實地被記錄了兩人在台交往的點滴。文類雖以「小說」稱之，然而卻紀實地呈現兩人的日常互動，和濱田離台前真切的心境與敗戰的反省。在小說中他藉由寫黃榮燦這位中國文化人的形象和品格，重新深刻地反省日人引起的戰爭罪行和體認敗戰的實感。返日後他聽聞二二八事件時，雖然能夠理解台灣省民迫切的心境，但仍擔心他的安危[44]。1994 年西川滿重刊〈小說 木刻畫〉時殊不知黃榮燦已在白色恐怖時期被逮捕入獄，並於 1952 年年末在馬場町被槍決，結束他的一生。

四、在台日人作家戰後初期的記憶書寫

戰後初期在台雖有日人警察遭襲殺害等事件，但相對於其他日本海外地區，台灣是相對安全。在台灣的日僑遣返作業主要有六次，西川滿與濱田隼雄

隼雄逝世後，西川滿又重刊〈小說 木刻畫〉，《アンドロメダ》第 273 號（1993 年 5 月），頁 8-11。根據陳藻香的研究，〈黃榮燦君——終戰後の台湾で〉約莫五千字左右，但〈小說 木刻畫〉（1978）卻有一萬兩千字。因此前者可以視為後者的底本。其中，撰寫前者時剛發生二二八事件。因此，改寫時才特別提及台灣省暴動的消息，意指二二八事件。陳藻香，〈濱田隼雄のヒューマニティー「黃榮燦君」と「木刻画」〉，《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 12 期（1997 年 12 月），頁 65-89。西川滿 1947 年夏天也在台灣遣返察寫了〈創作版画の発祥と終焉：日本領時代の台湾〉，但 1993 年時才重新整理刊出。

[43] 横地剛，《南天の虹——二二八事件を版画に刻んだ男の生涯》（福岡：藍天文藝，2001 年），頁 37-38。

[44] 在〈木刻畫〉除了以描寫黃榮燦為主之外，還提及的中央通訊社的記者余君和渡台的中國水彩畫家，根據横地剛地確認分別是余君應是葉明勛，水彩畫家是麥非。同註 43，頁 42。

兩人在第一梯次（1946 年 2 月 21 日——4 月 29 日)時即順利登船離台。據悉兩人在戰犯名冊中被列為情報課文化運動的負責人，深懼遭究責。因此，在接獲消息後，西川滿隨即將身邊的重要文件燒毀，其中還包括島田謹二寫給花浦夫人的大量信簡[45]，然後整裝帶著母親與妻小離台。

西川滿返日後仍執著於他的台灣鄉愁，成為戰後最積極投入書寫台灣的日人作家，在他的文本中反覆書寫離台前與台灣友人道別的場景記憶，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與文化狀況早已銘刻於這些作品中。戰後他將戰前的台灣鄉土文化知識轉化成他的文化記憶默默地攜回，並將它們重新編織進入他充滿浪漫幻想的大眾文學作品中，並受到當時日本文壇的關注，他靠著文壇友人長谷川伸、林房雄等人的大力提攜，成功地返回日本大眾文學界。在東京的他也熱心地協助返日的文友，例如《文藝台灣》同人濱田隼雄、立石鐵臣、邱永漢等人在東京的文化活動。

1958 年 7 月西川滿因受天命呼召，往宗教界發展並成立天后會，之後，發行了會報《アンドロメダ》（1969 年 9 月-1994 年 12 月，共發行 292 號），其中卻以他的文章居多，形同他個人的刊物，書寫戰前《文藝台灣》同人的重逢聚會和台灣友人來訪的點滴，成為他召喚台灣記憶的方式。然而，歷經時間的淘洗，他與一些戰前的日語作家類似，有意無意地遮蔽了某些個人經歷的真實性，例如：〈昭和十七年秋 滯日日記〉一文，其實是他為了出席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而上京的日記，但他和龍瑛宗一樣將它寫成「奈良之旅」，至於當時轟轟烈烈冒著生命危險出席的經過，卻隻字未提[46]。而有關戰後初期返日的散文，多憶及遣返初期一人攜家帶眷輾轉寄宿，靠著寫稿重建生活的艱困時日。

西川滿有多篇以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為場景的作品，或以離台道別告終，或反覆陳述被遣返離台的無奈心境。

以〈玫瑰記〉為例，這篇作品以音樂曲調為小標七大段，倒述日台通婚的悲劇故事。骨董商台灣男子鄭子賢為主角自述自己的婚戀故事，以玫瑰酒和畫有莅佳子的玻璃畫像作為物件，詳述台灣士林、板橋林家花園的的文化地景，

[45] 西川滿，〈花浦夫人のこと〉，《アンドロメダ》第 289 號（1994 年 9 月），頁 8-9。
[46] 西川滿，〈昭和十七年秋滯日　日記〉，《アンドロメダ》第 48 號（1973 年 8 月），頁 6-7。

台灣特殊的物質文化、城隍爺信仰，並將英國詩人法蘭西斯・湯普森（Francis Thompson）的生平軼事等皆編織進入文本中，充分地展現西川滿文學中特殊的浪漫的異國情調[47]。在情節鋪陳的過程中，他側寫戰後初期的台灣回歸中國後，台灣人對待日人的態度：「莅佳子！可憐的莅佳子！由於日本放棄台灣，台灣人的我就不是日本人了。不管你願不願意被貼上戰勝國的標誌，我的同胞竟因此蔑視戰敗國國民莅佳子。這真是被扭曲的命運。[48]」顯然西川滿也感受到戰後台灣人對日人的態度轉變。但是莅佳子的悲劇並非是來自於台灣社會對日人的欺壓歧視，而是源自於丈夫的外遇。雖是描寫日、台通婚，但西川滿仍以日本人為本位，日人女性莅佳子被刻劃得猶如「女神」般純潔完美的犧牲奉獻者。反之，台灣女性美玉因主角始亂終棄而從純情的女性，逐漸變成充滿感官肉慾的「魔女」，仍顯露出殖民者的偏見意識。

〈煉金術〉則是描寫中日戰爭期間古董商陳博士突發奇想，想要藉由燒金銀紙煉金。戰爭結束後，他仍舊煉金未成，主角我「本想在台灣永住下去，如今不得不被遣回，我全家要離開台灣時，陳博士卻專程來送行，他帶來刻有『保佑平安』的銀飾贈我作紀念。[49]」這樣溫馨告別的場景，也成為西川離台難忘的感動。

〈台灣脫出〉寫於五〇年代初，主要是描寫被遣返的日僑竟再度乘坐三十噸的小船「あかね丸」冒險偷渡登台，在當局防諜監控嚴密台灣港街中流竄，最後在台灣獨立黨友人寥（廖）等人的協助下，中共進犯的炮火中才趁機逃出的過程。作品仍未離大眾小說範疇，以狎客藝妓情義戀愛為主的故事，在緊湊的情節鋪陳中，生動地描寫人物之間複雜的情愛關係。但作者也透過主角五代道出：「希望心愛的台灣可以做為日本與中國永遠親善的媒介，這是他的悲願。因此，伴隨最近國際情勢的轉變，腐敗的官吏遭清肅，決然實施農地改革，台灣的人權逐漸受到尊重，只要為了台灣，他都很高興。[50]」的祈願。

---

[47] 西川滿，〈玫瑰記〉，《神明祭典》（東京：人間の星社，1970 年）。原刊於《大眾文藝》2 月號（1954 年 2 月）。
[48] 同註 47，頁 365-366。
[49] 同註 47，頁 188。原刊於《詩風土》第 24 期（1948 年 6 月）。
[50] 西川滿，〈台灣脫出〉，《台灣脫出》（東京：新小說社，1952 年），頁 177。

根據岡崎郁子（1949-）的調查，西川滿的〈惠蓮的扇子〉是少數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背景的日人小說[51]。根據中島的《西川滿全書誌》，1954 年西川滿曾以「劉小青」發表詩作〈天地の怒り〉（《台灣民聲》創刊號，1954 年 2 月）。隔年 2 月又發表〈惠蓮の扇〉（《キング》二月號，1955 年 2 月）一作。西川滿在二二八事件前已離台，因此這篇作品仍是他收集部分的文獻資料和友人口述內容重新編撰小說。

〈惠蓮の扇〉同樣以台北為小說舞台，大屯連峰遠景、淡水河景、陽明山的風景等成為小說主要的地景，它們也是西川滿重要的空間記憶。作者描寫日人「我」和女主角惠蓮因日、台身分的問題而無法結婚，但仍維繫某一種曖昧的情誼，「我」離台前對她仍有著不捨的曖昧情愫，而白檀的扇子成為串連兩人情感的物件。惠蓮最後選擇嫁給台灣人仲明，他是位台灣本土留日菁英的代表典型人物，熱情的抗日民族主義者，戰後興高采烈地迎接國民黨政權的到來，豈知二二八事件後因涉及指導白虎隊之罪名而被槍殺，妻子惠蓮尋仇失敗而選擇在監獄服毒自殺的悲劇故事[52]。

小說中詳述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過程，包括死傷人物真實姓名，例如林江邁、陳文溪等人，前述的東部墜崖自殺事件和二二八事件的白虎隊事件等。小說的「我」對於在台日人未能像其他歐美帝國移民地區得以選擇留下，自認為並非軍職人員，不應等同視之，對於被強制遣返而有所抱怨。但，王白淵對此將日本戰爭責任卸責給軍方的論調，曾提出嚴正的批判[53]。

另外，作者也假借主角仲明之口，批判在台日僑對中國卑屈的態度，例如收到「台灣已經變成中國了，我們日本人應該認台灣為兄長，而為中國盡力效勞」的宣傳單。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群眾運動，對於主角仲明明知這是一場缺乏組織領導的抗爭運動，但他卻不得不選擇站出來「賭命」，深感敬佩。

---

[51] 岡崎郁子著，妹尾信子譯，〈西川滿先生和二二八事件〉，《淡水牛津文藝》第 4 期（1999 年 7 月），頁 71-72。

[52] 台灣發生 228 事件時，花蓮地區的青年組成「白虎隊」、「金獅隊」等，負責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白虎隊」為自中國海南島歸來之復員軍人所組成，主要成員有李居萬、簡阿章等人。林正慧，〈白虎隊〉，《二二八事件辭典》（台北：國史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 年），頁 96-97。

[53] 王白淵，〈致日本人諸君（續）〉，《人民導報》，1946 年 3 月 2 日，第 3 版。

西川滿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屠城與台籍菁英被捕殺的憤怒與同情溢於言表。「我」對於發生這樣的悲劇深感歉意：「這是因為日本發動錯誤的戰爭，害了你們成為悲劇的主角，你們卻不埋怨而寬容，熱愛日本、信賴日本人的我，至少該讓我贖罪。[54]」這篇小說這樣的結尾顯露出西川滿個人在戰後某種程度的贖罪意識。

西川滿返日後活躍於日本的大眾文學界，他的作品以情節的趣味性和男女情愛作為小說敘事主軸。他偏愛台灣地景和特殊的民俗信仰活動、物質文化等，藉以展現有別於日本文學的異國情調。然而他所設定的「台灣人」，其人物形象及其心理描寫，卻充滿作者個人文學想像的虛構性。「不在場」的西川以台灣地景為其空間，將時事性的報導錯置其中，以歷史寫實與文學虛構交織的方式，完成了這篇紀念二二八事件的作品。然而，他依舊無法深入刻劃台灣人跨時代複雜的心理變化、事件衝突過程中的悲劇性或深究其原因等等。儘管如此，這是一篇刊於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大眾文學雜誌《キング》的作品，藉此讓更多的日本讀者知道這個國民黨政府在台的鎮壓事件，進而達到文學傳播的價值。因此，〈惠蓮的扇子〉應是一篇台灣二二八文學書寫史中不可不談論的作品。

除了西川滿之外，濱田隼雄 1946 年 4 月一家六口也被遣送返回故鄉仙台，返日後他亦曾積極寫作試圖重返日本中央文壇，但卻無功而返，只好選擇留在仙台擔任高中教員以維繫家計，但仍維持寫作的習慣，繼續在東北地方從事地方文史工作，1968 年自學校退休後，「發揮自由人的立場」終身創作不輟[55]。他返日後除了上述曾憶及黃榮燦之外，他也憶起他的得意門生林素琴並撰寫小說〈素琴〉一文[56]。這位林素琴（原名：林素珍，日本名林こずゑ）真有其人，她是「台北帝大唯一台籍哲學女學士」，身為台灣的菁英女性在戰後雖留職於台大哲學系擔任助教。1956 年後來追隨丈夫林廷堅前往美國，並取得社會學碩士[57]。

---

[54] 同註 27，頁 11。

[55] 松尾直太，〈濱田隼雄研究——台灣遣返作家的文化活動（1946-1962）〉（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 年），頁 5-6。

[56] 濱田隼雄，〈素琴〉，《小說文庫》2 卷 5 號（1947 年 5 月），頁 52-65。此篇小說原文由河原功教授提供，謹此誌謝。

[57] 吳秀瑾、陸品妃，〈第十五章 台北帝大唯一台籍哲學學士林素琴〉，《啟蒙與背叛 台灣哲學的百年浪潮》（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 年），頁 435-475。

濱田隼雄的〈素琴〉主要是敘述自己戰爭期間服役結束後，1937 年 12 月從台南第一高等女學校轉任至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擔任教諭時，發現本島學生林素琴表現甚為優秀，有種得英才而教育之的喜悅。因此，他在家長（林呈祿）的認可同意下，計畫性地讓她博覽群書拓展閱讀視野，並提問討論藉以鍛鍊她的思考能力。素琴以第一位本島人優等生的成績畢業後留日，在此期間師生持續互有書信往來。小說最後作者描寫了離台前的離情與對素琴的期許，文中的師生情誼讀來令人動容。

林素琴九〇年代以「李翠竹」之名出版的《素蘭の迷路から》將〈素琴〉的部分內容改寫重新置入書中，並以「素蘭——（東先生の思い出の記）」和「私の生活（女学校四年生の芳素蘭が書いた作文）」兩段複寫她的殖民地記憶[58]。濱田與林素琴的記憶交集之處，在於受殖者在殖民地的教育現場如何受到歧視壓抑，戰爭末期屈就於當局的干涉而不得不改姓名，但師生兩人卻跨越種族的藩籬建立知性的互動。

戰後濱田雖受到慰留，但他仍認為如果要建設新台灣，全部的日本人都應該離開台灣，因為「日本性」的東西「小而獨善又無力」，這場戰爭是被「世界性」的東西所打敗的。他要素琴不要拘泥於「日本性」，而要放眼「世界性」，憑藉她的能力與努力是綽綽有餘的。但不只投身婦女運動，以她具有批判性的眼光，應是可以洞見深且大的事物的[59]。雖然這是一篇小說形式的作品，其中也蘊含著許多日籍教師離台前，對台籍學生最後的叮嚀與對他們成長的期許。相較於西川的記憶書寫，濱田記憶所繫之處更側重於與「人」的互動與交流，而這份溫暖的師生情誼也成為濱田生命與台灣重要的記憶連結。

五、結語

戰後被遣返的日僑文化人（特別是灣生或準灣生）有其面對殖民地的鄉土認同與戰爭反省的矛盾與尷尬，但日本敗戰後「故鄉」已成「他鄉」，殖民加害

[58] 李翠竹，《素蘭の迷路から》（東京：鈴木隆子，1990 年），頁 14-33。
[59] 同註 56，頁 64。

者的原罪與遣返的被害者情緒並置於一身，有秩序地接受戰後的遣送安排離台返日，背負著戰敗國民的海外記憶投入日本戰後的社會重編。返國前，他們透過戲劇活動、木刻畫交流、譯介編輯活動等，參與戰後台灣文化的重建活動。另一方面，他們由於長期旅居或生長在台灣，返日後成為「外來者」與國內日人競爭戰後有限的社會資源，因此受到有形無形的排擠歧視，心理層面上成為在日的「異邦人」,「台灣」轉而卻成為他們鄉愁所繫之處。

同樣地，戰後初期台灣人亦面對國府接收的種種社會經濟亂象，其無奈與苦悶之情亦難以言表。離台前的日僑清楚地見證了，台灣人如何從高舉青天白日旗歡迎祖國，又如何厭惡國民黨政權的心理轉折過程，特別是二二八事件後才離台的日僑。他們成為台灣人跨時代的理解者和記憶書寫的分享者。他們和台籍作家複述戰後初期的記憶敘事內容甚為類似，記述中國軍隊登台或東部墜崖自殺事件，但仍客觀記述部分外省籍人士的在台處境。同時，因他們身處日本享有更多的輿論自由，比台灣島內更早公開回憶二二八事件與悼念無辜犧牲的友人。

《文藝台灣》的主編西川滿因在事件之前早已離台，有關事件的消息都是耳聞而來，被迫遣返內心有較多的無奈與怨懟，對台灣鄉土懷有較濃厚的鄉愁。在西川滿的遣返者文學中，雖有些許的殖民反省，關注戰後台灣社會發展，耽溺於個人對台灣鄉土思慕之情。反之，濱田則更重視戰後初期與在台的外省人黃榮燦和本省學生林素琴真誠而有溫度的往來點滴。戰後初期《民俗台灣》的同人因留用的關係，見證了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民眾一起經歷過暴動，留用卻又被迫離台的轉折，讓他們對國民黨政權有直接的認識，反而更清楚地體認到離台的必要性。他們更能對台灣人的處境較能感同身受，形成屬於他們共體時艱的情感結構。在歷史的洪流中他們仍別無選擇地背負著時代的陰影，回到各自的「祖國」，努力地走過戰後的歲月並重新建構各自的集體記憶。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 年）。

日影丈吉，《日影丈吉全集 6》（東京：國會刊行會，2002 年）。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6 號（東京：綠蔭書房，1988 年）。

末光欣也，《台湾・激動の戦後史 二二八事件との前後》（台北：致良出版社，2006 年）。

立石鐵臣，《立石鐵臣台灣畫冊》（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7 年）。

西川滿，《台灣脫出》（東京：新小說社，1952 年）。

西川滿，《神明祭典》（東京：人間の星社，1970 年）。

呂東熹，《二二八記者劫》（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16 年）。

志賀秀孝，《麗しき故郷「台湾」に捧ぐ——立石鐵臣展》（東京：府中市美術館，2016 年）。

李喬，《埋冤 1947 埋冤》，（台北：海洋台灣出版社，1994 年）。

李翠竹，《素蘭の迷路から》（東京：鈴木隆子，1990 年）。

周華斌，《洄溯與再生—台灣文學史料集刊》第六輯（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6 年）。

林元輝編，《二二八事件台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9 年）。

林正慧，《二二八事件辭典》（台北：國史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 年）。

河原功，《台灣引揚者關係資料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2011 年）。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2003 年）。

揚・阿斯曼著（Jan Assmann），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焦桐，《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台北：臺原出版，1994 年）。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台北：聯經出版，2016 年）。

塩澤亮繪著，張良澤譯，《從台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一位台北女子師範學校教授在戰爭末期的紀錄》（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 年）。

新垣宏一，《華麗島歲月》（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 年）。

褚靜濤，《二二八事件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

鄧敦民、洪子偉等人編，《啟蒙與反叛 台灣哲學的百年浪潮》（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 年）。

橫地剛，《南天の虹——二二八事件を版画に刻んだ男の生涯》（福岡：藍天文藝，2001 年）。

George H・Kerr 著，詹麗茹、柯翠園譯，《重譯校註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台灣教授協會，2014 年）。

二、期刊論文

立石壽美，〈立石壽美女士來函〉，《淡水牛津文藝》第 4 期（1999 年 7 月），頁 192。

安藤芳男著，張良澤譯，〈終戰前後的台灣秘史——未被發表過的台灣內幕〉，《淡水牛津文藝》第 5 期（1999 年 10 月），頁 207。

池田鳳姿著，陳藻香譯，〈《台灣的家庭生活》點滴及戰後初期的台灣・艋舺〉，《台灣文學評論》5 卷 2 期（2005 年 4 月），頁 33。

岡崎郁子著，妹尾信子譯，〈西川滿先生和二二八事件〉，《淡水牛津文藝》第 4 期（1999 年 7 月），頁 71-72。

徐亞湘，〈省署時期台灣戲劇史微探〉，《戲劇學刊》第 21 期（2015 年 1 月），頁 77-79。

張良澤輯，〈池田敏雄先生年表〉，《台灣文學評論》5 卷 2 期（2005 年 4 月），頁 64-65。

陳偉智，〈知識的接收——國分直一與戰後初期的臺灣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61 期（2018 年 6 月），頁 97-157。

陳藻香，〈濱田隼雄のヒューマニティー「黄榮燦君」と「木刻画」〉，《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 12 期（1997 年 12 月），頁 65-89。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與留用：兼論臺灣高等教育的復員〉，《臺灣文獻》61 卷 3 號（2010 年 9 月），頁 287-329。

謝里法，〈中國左翼美術在台灣（1945-1949）〉，《台灣文藝》第 101 號（1986 年 7 月），頁 130-131。

三、學位論文

松尾直太，《濱田隼雄研究——台灣遣返作家的文化活動（1946-1962）》（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 年）。

四、報紙文章

王白淵，〈致日本人諸君（續）〉，《人民導報》，1946 年 3 月 2 日，第 3 版。

作者不詳，〈柯參謀長的沉痛語堅持國家民族立場〉，《台灣新生報》，1947 年 3 月 5 日，第 1 版。

作者不詳，〈留臺藝人改變作風排演中國革命劇〉，《人民導報》，1946 年 2 月 13 日，第 4 版。

作者不詳，〈歡迎投稿〉，《人民導報》，1946 年 1 月 8 日，第 3 版。

栗原廣美，〈吳金鍊を憶ふ〉，《全國引揚者新聞》第三號，1948 年 10 月 1 日，第 4 版。

五、雜誌文章

守田富吉，〈二二八事件当時の回想〉，《台灣青年》第 27 期（1963 年 2 月），頁 4-8。

西川滿，〈花浦夫人のこと〉，《アンドロメダ》第 289 號（1994 年 9 月），頁 8-9。

西川滿，〈昭和十七年秋滯日日記〉，《アンドロメダ》第 48 號（1973 年 8 月），頁 6-7。

西川滿，〈創作版画の発祥と終焉：日本領時代の台湾〉，《アンドロメダ》第 271 號（1993 年 3 月），頁 11-12。

松居桃樓，〈もしもあのとき—陳炘と林茂生さんの死—〉，《台灣青年》第 27 期（1963 年 2 月），頁 16-19。

林樹理，〈二月反亂見聞記〉，《台灣青年》第 27 期（1963 年 2 月），頁 9。

金關丈夫，〈すれちがい〉，《台灣青年》第 27 期（1963 年 2 月），頁 13-15。

柯遠芬，〈事變十日記〉，《正氣月刊》2 卷 2 期（1947 年 5 月），頁 41。

濱田隼雄，〈素琴〉，《小說文庫》2 卷 5 號（1947 年 5 月），頁 52-65。